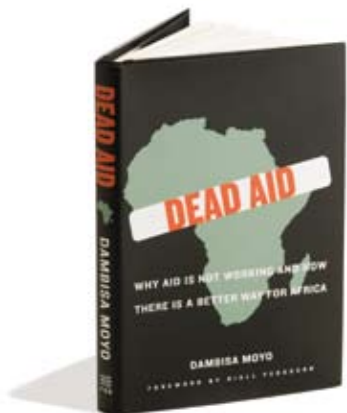


僵化的复古主义者的论点



Dambisa Moyo著

无用的援助

为什么援助在非洲不奏效？有什么好方法？

Farrar、Straus和Giroux，纽约，2009年，188页，24美元（平装）。

Dambisa Moyo对援助体系的引起广泛争议的抨击——相对应的是你可能听说过的某个体系——从未提过任何援助五年之内都应该终结。Moyo确实就迅速切断所有援助的后果提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问题，但第76页的内容使人们清楚地看出了她的真实见解：其中大多数意见聚焦于利用援助来鼓励建立非援助性的融资机制，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现“无援助的世界”的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减少援助。

为了评估这本书是否能令人信服，我们有必要理解，问题不在于非洲应该如何发展，而是什么样的融资机制能给非洲带来更好的发展成果。Moyo将援助定义为通过赠款或优惠性贷款，系统性地将资金划拨给政府——忽略了直接向穷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援助和慈善援助。Moyo的任务是表明如此定义的援助并不能给普通非洲人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而只有一套替代的发展融资机制才能极大扩展普通非洲人的经济机会。

我看完这本书后产生三种想

法：这本书对援助体系的谴责是其最令人信服却不太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所提议的援助体系替代方案则是最有独创性但却最不令人信服的。出于这两个原因，更恰当的说法是本书首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写了些什么，而在于谁写了它。下面我将对此一一论述。

首先，本书就援助系统的一些虚构的理论和深层的瑕疵实施了一整套的空袭。以某种尺度来衡量，这些指控一般是正确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有价值的。我只列出很少几点。将重建富裕欧洲的成功马歇尔计划移植到一个贫穷的大陆，捐助者在此方面没有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来借鉴。捐助者在设计这样一种援助机制方面频频受挫：这种机制应能在援助有效提供的失败方面准确地、可信地惩罚失误，或者能够可靠地限制向腐败的体制提供援助。最近的债务危机与其说是捐赠者缺乏免除债务的利他主义气度的一个迹象，倒不如说是前几轮债务减免没能触及问题实质的一个表征。通过良心谴责和强调援助的魅力来激发捐赠者援助的积极性，与推动对后果严肃地承担责任不协调。援助界有明显的动机将非洲描画得无助而又贫穷，这种印象直接削弱了非洲吸引私人投资的努力。

这些指责不幸一语中的。当然，这些指责并没有什么独创性，它们所指出的问题正是以前就有人提出过，并广泛见诸于Peter Bauer、William Easterly、Nicolas van de Walle、Eberhard Reusse、David Sogge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正如Moyo所指出的那样。因此，它们在这里的价值不外乎响亮地提醒世界，许多问题常常被文雅的谈话遗漏掉了——并且有必要不断地将紧迫性告知世人。

其次，本书就非洲的融资发展提出了四个替代方式。在这方面，本书倒是颇有新意，并成为引

起争议的头脑风暴。但是，本书所勾画的政策蓝图却显得踌躇不定，因为它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迅速向着它所提议的融资机制改变将极大地提高发展成就。即使这是正确的，本书也没有说明这种融资机制是什么。

• Moyo指出，应该对更多的非洲国家和企业进行债券评级，并向它们开启私人证券市场。读者没听说过非洲的许多小国和穷国（包括贝宁、马里和马拉维）已经获得过惠誉或者标准普尔的主权评级（正如Todd Moss所观察到的，即使有这种评级，也要由捐赠机构来买单）。而且，单单通过债券评级就能释放出大量的私人资本这种说法并不为大众所广泛接受。Dilip Ratha的研究表明，对未评级国家进行评级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数差异，可以轻易地根据现有的可随处获取的有关这些国家的信息预测到。因此，评级本身能告诉投资者多少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尚不明确。而且，本书所展示的两个在大规模吸引债券融资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之一——加蓬（第93页）——不幸地被世界银行“治理重大事项项目”排在全球各国“控制腐败”最差的12%的国家之列。这恰恰不能支持本书“援助就是问题”以及要以其他形式的融资来解决该“问题”这一僵化的论点。

• 《无用的援助》对中国政府推动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表示赞赏，认为其他捐助者也应因循该模式，但是它们的援助却妨碍了FDI。读者应该对Moyo的证据作出正确的反应，她的证据表明，78%的坦桑尼亚人将中国的影响看作是有益的，而仅有36%的坦桑尼亚人对美国持有这种看法。但是正在出现的其他问题使我们对给予中国的所有赞誉感到不知所措：伴随中国FDI的来自中国巨额援助流量为什么不会对其他援助构成同样明

显的阻碍？如果西方的援助阻碍了西方的FDI，那为什么没有阻碍中国的FDI？更好的讨论应该关注于限制成功的因素，以及在尝试鼓励FDI（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FDI）的长期历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

• Moyo建议，在诸多事项中，捐助国应该通过削减其对棉花、蔗糖等农产品的慷慨补贴，以停止对非洲出口所造成的伤害。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降低依然存在的贸易壁垒会对非洲产生较大影响的证据仍显不足。Nancy Birdsall、Dani Rodrik和Arvind Subramanian曾指出，1994年14个非洲国家的货币贬值——这使得其国内所有出口品的价值立即翻番——没有使西非棉农实现持续的减贫。

• 最后，Moyo还提议通过诸如扩大小额信贷和降低国际工人侨汇的手续费等手段，来动员非洲自有的资本。这些似乎合理的好的融资主意值得给与更多的关注，但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发展成果仍然不清楚。Jonathan Morduch和David Roodman严厉地指出，尽管小额信贷是发展周期中的明星，但要谈其减贫效应巨大，证据还相当不足。而且直到非洲各国允许更多的非洲人自由流动之前——比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真正实施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权利公约，或者富裕的捐赠国扩大非洲人在其境内暂住工作的机会——对侨汇成本给予几个百分点的优惠对于侨汇流量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但是，本书所提出的建议还是有一些闪光点：更多地发行“集体债券”能使多个小国资本增加，同时还能对风险进行统筹化解，跟随着南非的泛非基础设施发展基金降低交易壁垒。为实现国际一体化，向非洲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基础项目包括主要道路和电力线路的建设与维护。

这些亮点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其直接道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所面临的基本挑战：以美元衡量，48个国家的总的经济规模大大小于美国城市芝加哥。如果没有使其邻近地区共同发挥作用的金融和其他机制，芝加哥的经济根本不可能避免这些国家的此种命运。对于非洲来说，集体债券、道路以及移民工作都在沿着各方协调的方向发挥作用。

“本书由于对某些需要证据加以评判的陈述太过于武断而受到大大削弱。”

本书由于对某些需要证据加以评判的陈述太过于武断而受到大大削弱。它固执地坚持，用援助来“为经济失误提供担保”这种做法很难以与下述事实相符，即许多援助大大超过GDP的10%的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实际增长表现强劲，这些国家包括加纳、坦桑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本书对事实缺乏更仔细的核查，而且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错误：例如它声称“对非洲的援助金额在缓慢收缩”，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却报告，在1997年到2007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流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从320亿美元增加到580亿美元。

第三，尽管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还是有一个理由值得对本书加以关注，即它是由非洲人撰写的。这一明显的事实毋庸置疑——而且确实，在学术权威Niall Ferguson为本书撰写的前言的第一句话中，他就向世人大声宣告了这一点。像半个世纪前Kwame Nkrumah的《非洲必须联合》一样，《无用的援助》深刻而有效地指出了当前的国际体系在促进非洲发展方面所遭遇

的失败。同样，与Nkrumah相似，即使Moyo在为过去混乱的政策提供意见时碰巧找到了具体的替代方案，但她还是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种真实的观点：在西方人给予非洲的待遇的问题上，非洲人普遍感到某种失意。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Nkrumah和Moyo的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最主要的论点是正确的，即非洲的发展主要掌控在非洲人手里，外部的促进非洲发展的尝试都会面临内在的局限性。而当这一观点由非洲人提出来时，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于是，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必然不同于如何为非洲的发展融资这一角度：为什么西方人绝少看到非洲人撰写和阐述的关于援助与发展的具有深度的关键性分析？这些著作肯定存在（包括由Benno Ndulu、Agustin Fosu、Ngozi Okonjo-Iweala、Andrew Mwenda以及其他许多人撰写的著作），但它们太少，而且大多不为西方人所知。也许这是因为需求有限：西方的出版机构与编辑更加偏爱西方的作者，也许是供应有限：尖刻的非洲人正在寻求最好的发展方向，其在批评捐助者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这些捐助者可能会是其融资提供者或者客户。也许还有其他许多原因。

清楚的是，必须让人们听到非洲人有关这些重大问题的更多呼声。今年，Hewlett和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向公众透露了一项大规模的计划，对遍布全非洲的24个政策智库提供支持——这是为打破非洲与世界在发展思路之间的壁垒而采取的重大步骤。我希望其所培育出的批判性思维将在这关键的十年中为非洲作出更大的贡献。

Michael A. Clemens
全球发展中心研究员

低标杆的严格的庇护人



Eduard Brau和Ian McDonald编

IMF的成就

合作工作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Palgrave Macmillan, 纽约, 2009年, 231页, 34.95美元(平装)。

这本书汇集了IMF工作人员的论文集,并附有相关的观察家的评论,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这本文集与其说是为了回应那些质疑IMF所开出的政策处方过于无情的左派,抑或是回应那些指责IMF的政策处方过于宽厚或具有误导性的右派,倒不如说是给IMF的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本书所列举的6个IMF提供金融援助的案例研究包括:1998年对韩国的援助、1990—1991年对波兰的援助、2001—2002年对土耳其的援助、1995—2007年对坦桑尼亚的援助、2002年对巴西的援助,以及2002—2003年对乌拉圭的援助。本书每章包括一个由当事人或者与计划或行动关系密切的观察家所撰写的评注,这些评注为本书增色不少,但是并没有充分展开,其主要目的在于评论。出于对充分披露事实的兴趣,我成为6个国家案例中的4个案例(不包括坦桑尼亚和乌拉圭)和所有援助活动的参与者或者近距离的观察者。

这6个案例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都关注于各国当局和IMF的关键决策。6个案例中,有5个描述了

援助计划的往往旷日持久且不太成功的结果,以及各国与IMF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并没有在每一篇论文中完全承认这个事实。乌拉圭的案例是一个重要例外,尽管波兰的转轨计划也是合格的。坦桑尼亚案例研究中出人意料的局面也令我印象深刻。IMF在1995—2005年向该国提供了4亿美元的融资援助,而后又在2006年注销了该国在IMF的剩余债务。

有关IMF其他援助活动的3篇论文主要是描述性的,其并没有转移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些事件,或者对这些事件已经淡忘了的人们对这些援助计划总体有效性的关注。有关IMF工作人员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文章提供了起始于1980年的较长期的有用的历史资料。但此类文章比其他文章更具有自我摆功的味道,其结果不太令人信服。这些论文总体上看详细解读了IMF的援助计划所产生的有关经济、金融和政治的各不相同的问题,而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提供金融支持。读者可能会被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IMF是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设计其援助计划。

这些文章迫使读者们去思考对IMF计划而言的“成功”的含义。编者以一个相对较低的标杆,将IMF的成功定义为作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并对IMF的金融支持进行了反事实的推断,认为没有这种支持,一些国家(也许还有它们的近邻,也许是全世界)的直接的经济和金融后果可能会更糟。他们还列举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作为替代方案,一些国家可能会得到来自其盟友的金融支持,但这不包括导致全面成功的政策改革。

这些文章和评论的含糊其辞,以及间或的坦言,是对IMF成就的第二种检测:来自IMF的政策意见就会更好一些吗?几乎所有的案例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且作者往往都会加以注

解,乌拉圭的案例尤为如此。但对于判定任何一种危机应对手段来说,这种检测方法过于粗糙了。

这6个案例研究所传递出的压倒一切的信息是“所有权”的重要性。援助计划属于各国当局,各国当局为它们的制定而奋斗,对其内容拥有决定权。韩国不属于这种模式,该国舆论仍然把危机情景看作是“IMF的危机”而不是韩国的危机。但即便在这个案例中,直到新的韩国政府对援助计划拥有所有权之前,其他国家的金融当局也不愿意通过IMF将更多的资金注入韩国,而是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放给外国债权人。

本书通过巴西和乌拉圭案例所集中体现的有关IMF在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中的信息,展示了实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即灵活性,准备好承担风险,拥有充足的资金,从而能对各国的需求和多变的环境作出恰当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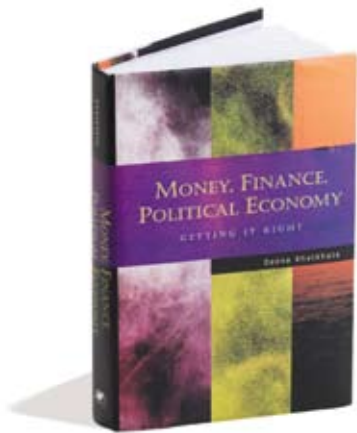
关于IMF的改革,本书所给出的信息多少有些不尽如人意。Tom Dawson参与撰写的论文提醒读者,IMF的透明度和责任性受控于其的成员国。例如,成员国最终决定着董事会文件和IMF出版物发布的规则,这些文件和出版物大多数与这些国家有关。该论文的另一作者Charles Enoch同样论述了国家的透明度,他指出,自从1999年“特别数据发布标准”确定以来,成员国在数据发布方面一直不愿提高未来数据发布的标准。

总体上看,作者们可能仅仅是略施身手,但其思辨性地深入考察了IMF这个处于全球核心地位的机构,指出了其在演进过程中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Edwin M. Truman

国际经济学Peterson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超越了他的时代



Deena Khatkhate 著

货币、金融与政治经济学

走上正轨

学术基金会，新德里，2009年，385页，39.95美元（精装）

哲学家Kierkegaard曾写过：“生活就是活在前而明白在后”。这本收集了印度经济学家Deena Khatkhate一生著作的文集，可以被人们理解为是对作者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等大多数知识遗产的反叛，其对南北关系也进行了抨击。另外，这些文章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勇敢的（但并非不加批判的）捍卫向前推进了一步，像信奉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一样信奉弗里德曼，并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方法。

本书对最后一个主题的阐述毋庸争辩是整个文集里最好的一篇文章，其是关于人才外流的——发展中国家的熟练技术工人向发达国家移民。在这篇于1971年发表在《金融与发展》的文章里，Khatkhate向将人才外流视为坏事，视为穷国向富国提供援助的一种方式的流行观点发起了挑战。他明确指出，大多数外移的移民来自熟练工人供

应量过剩的发展中国家，这对穷国具有实际上的社会保障价值。而且由于其鼓励了来自穷国与来自富国的高技能工人之间“思想的横向促进”，人才外流可看作是“一项可期待的投资”。

有关这种预言的例证正一一涌现出来，印度、爱尔兰和以色列等国家向更发达的国家出口软件所取得的成功即为一例。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Ashish Arora指出，这种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储备了一支未充分就业的工程师与科学家大军，他们提前就已经向美国和英国移民了”。尽管他们在国外工作，这种散居收获的是与其未来的客户一起从事经商实践的经验——正如Khatkhate所预言的，较早期的人才外流变成了人才收益。

本书关于南—北关系的其他几篇论文包括写于1987年的一篇论述“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的文章，文章预料到IMF和其他国际机构将进行的许多改革——例如在决策时给与南方“更大的话语权”。这些举措有的已经采取，有的已经提上议程。Khatkhate只是提出类似建议的诸多人士之一。但是正如他在前言中提到的，由于他当时就职于IMF，他的文章“引起了热烈争论”。不管怎么说，Khatkhate在工作两年之后很快离开了IMF，成为学术期刊《世界发展》的一名编辑。

在加入IMF之前，Khatkhate在印度储备银行（该国的央行）工作了10年——1955—1968年。因此，本书的第二个主题自然是论述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时，Khatkhate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赤字财政，以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由于这类经

济体存在未充分就业的资源，加大政府支出可以使其得以就业，且不会激发通货膨胀。但是Khatkhate写道，有关政府支出实际影响的负面证据使他确信，“过度依赖于财政赤字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以及收入、储蓄与投资的下降”。Khatkhate有关货币政策的观点也与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有所不同，强调了有必要设立指导央行的规则，而不是使其变得更谨慎。

“这些文章将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勇敢的（但并非不加批判的）捍卫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三个主题涉及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粉饰及其实际的情况。Khatkhate指责社会主义试图既实现经济增长，又实现社会平等，而实际上两者并不能兼顾。他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收入分布有多不均，而在于“提高全体大众的生活水平，而这只能依靠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些观点与Khatkhate于1978年在撰写本文时的主流观点相去甚远。但是，他不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一成不变的捍卫者，比如，鉴于仓促的自由化可能会引致金融危机，其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就接近于他的同胞Jagdish Bhagwati，后者偏向于采取审慎的方法。

Charles Collyns和Prakash Loungani

分别为IMF研究部副主任与高级顾问